

洪名勇◎等著

贵州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研究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173056)

省长资金资助项目[黔省专合字(2009)91号]

贵州大学文科重点学科特色学科项目(GDZT201104)

贵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

洪名勇 等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贵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洪名勇等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 - 7 - 5136 - 2289 - 9

I. ①贵… II. ①洪… III. ①农村土地承包法—研究—贵州省 IV. ①D927. 730. 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47282 号

责任编辑 戴玉龙

责任审读 霍宏涛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白朝文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4. 25

字 数 217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6 - 2289 - 9/F · 9627

定 价 56.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第一章 贵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背景

一、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激活了资源要素的再配置	001
二、城镇化的推进	006
三、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后提供了可供流转的土地	008

第二章 贵州农村土地承包权市场：一个总体概览

一、贵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运行的总体情况	013
二、区域比较中的贵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	016
三、贵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初步成绩	019

第三章 贵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基于问卷的调查分析

一、研究区域与调查样本	022
(一) 研究区域	022
(二) 调查方法	023
(三) 调查样本描述	023
二、农户转入土地行为	024
(一) 农户转入土地的数量	024
(二) 农户转入土地的形式	025
(三) 农户转入土地的约束条件	026
(四) 农户转入土地的类型	028
(五) 农户转入土地的态度	029
(六) 农户不愿意转入土地的原因	029
三、农户转出土地的行为	030
(一) 农户转出土地的数量	030
(二) 农户转出土地的形式	031

(三)农户转出土地的约束条件	031
(四)农户转出土地的类型	033
(五)农户不愿意转出土地的原因	033
四、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分析	034
(一)家庭耕地面积与土地流转的关系	034
(二)单块土地面积与土地流转的关系	035
(三)非农就业机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	035
(四)收入结构与土地流转的关系	035
(五)农户的个人特征与土地流转的关系	036
(六)农村社会保障与土地流转	037

第四章 贵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研究

一、贵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调查	039
(一)蔬菜合作社+基地+农户社经营模式	039
(二)反租倒包模式	042
(三)土地入股模式	044
(四)返乡创业农民工带动模式	046
(五)土地整治项目带动模式	049
(六)三资转换模式	052
(七)产业主导,整村推进模式	053
(八)“高效农业模式”发展模式	054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054
(一)负责土地流转的职能部门不明确	054
(二)农户的土地思想意识比较落后	055
(三)农户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风险	055
(四)村集体作为发包方,主体地位不明确	056
(五)土地流转管理的不规范	056

第五章 平坝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基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视角的分析

一、样本区选择	059
---------------	-----

(一)数据的来源与说明	060
(二)平坝县的基本情况	061
二、兴农农资供销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研究	062
(一)合作社基本情况	062
(二)合作社流转土地的行为特征	063
三、鼎兴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研究	070
(一)合作社基本情况	070
(二)合作社流转土地的行为特征	072
四、万佳农贸农民专业合作社土地流转研究	073
(一)合作社基本情况	073
(二)合作社流转土地的行为特征	074
五、平坝县土地流转的成效	078
(一)土地规模经营水平提高	078
(二)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078
(三)实现农民增收	079
(四)充分利用土地	079
(五)转移农村劳动力	080
(六)农业科技水平和机械化水平提高	080
(七)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提高	081

第六章 交易成本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交易成本:文献综述	083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交易成本	086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交易成本 产生(存在)的原因	086
(二)流转农户成本-收益模型中的交易成本	087
(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交易成本的分类	088
三、研究假设	090
四、问卷的变量选择及其定义	090
(一)交易成本变量的选择	091
(二)农户个人变量及家庭变量的选择	092

(三) 变量的操作性定义	092
五、实地调查及样本描述	093
(一) 调查时间与方法	093
(二) 样本地概况及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状	093
六、调查结果分析	095
(一) 两类样本地区的基本描述性统计	095
(二) 变量的信度检验	099
(三) 因子分析	100
(四) 计量模型的建立及运行结果	103
七、研究结论	104

第七章 基于心理契约的农地流转研究

一、引言	107
二、基于心理契约的农地流转理论框架	108
(一) 心理契约定义改进	108
(二) 心理契约模型改进	109
(三) 心理契约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普遍性	112
三、研究设计	113
(一) 研究假设	113
(二) 评价指标与衡量	114
(三) 问卷设计	117
四、实证分析	120
(一) 问卷调查	120
(二) 样本描述	122
(三) 计量检验	123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128

第八章 信任、信任博弈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口头契约研究

一、概念框架	131
(一) 口头契约	131

(二) 信任	133
(三) 信任博弈	135
二、信任博弈视角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口头契约研究	138
(一) 信任博弈模型	138
(二) 信任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口头契约	150
三、信任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口头契约自我履约 机制研究	155
(一) 研究假设、变量选择和计量模型	155
(二) 信任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口头契约自我履约： 一个描述性的分析说明	156
(三) 计量结果	159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160
 第九章 信任机制对于农地流转习俗的影响研究	
一、农地习俗制度及农地流转习俗	163
(一) 农地习俗制度	163
(二) 中国传统的农地习俗制度	164
二、农地流转中的信任机制	167
(一) 信任机制	167
(二) 土地流转中的信任机制	168
三、信任对土地流转习俗制度影响研究	172
(一) 研究思路	173
(二) 研究假设	173
(三) 信任的计量	175
(四) 数据检验结果分析	175
四、信任与农地流转口头契约习俗实施机制	179
(一) 农地流转习俗制度—口头契约	179
(二) 农地流转口头契约自我履约机制分析	180
五、研究结论	184

第十章 贵州省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因素、存在问题及对策

一、影响贵州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相关因素	185
(一)农户的资源禀赋	185
(二)信任机制的影响	186
(三)交易成本的存在	187
(四)土地产权	187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188
(一)研究假设	188
(二)资料来源	189
(三)变量选择及检验	189
(四)多元回归计量模型(Logistic 模型)的建立	192
(五)计量结果	193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196
三、贵州省土地流转亟待解决的问题	196
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剖析	200
五、实现土地有序流转的对策和建议	202
(一)转变观念,提高认识	202
(二)构建清晰稳定的农地产权制度	202
(三)加强和完善法规制度建设	204
(四)遵循土地流转原则	204
(五)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工作	204
(六)建立健全土地流转管理机制	206
(七)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化的配套服务	207
(八)探索土地流转的新形式	209
(九)制定相关鼓励政策	209
参考文献	211
后记	217

贵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背景

农地流转的核心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因此,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简称农地流转。所以,在本书中,我们根据行文的需要,有时称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有时称为农地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在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农村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这三大背景下展开的。

一、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激活了资源要素的再配置

传统农村土地制度让各种要素不能通过市场流转和再配置。我们知道农村土地产权集体所有、集体使用的产权制度安排在农村生产要素配置方面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降低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大量农业隐性失业。如果我们将每个劳动者(农民)的时间分为两个部分,即劳动时间和闲暇。在人民公社农地外在产权制度安排中,对于每个农民的积极性的,我们可以通过农民的努力程度来度量,劳动者每天的劳动时间是固定的,从而闲暇时间也是固定的,但每个劳动者劳动的努力程度并不是标准的努力程度,而是一个可变量。这样,在人民公社农地外在产权制度安排下,每个劳动者的劳动供给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劳动努力程度。劳动者通过闲暇(偷懒、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等方式实现闲暇),可以减少在劳动中的体力和脑力消耗,也就是可以通过降低劳动努力程度来提高自己的效用。这样,每个劳动者的效用函数为:

$$\begin{aligned} & \max u(y, e) \\ & \text{s. t. } \partial u / \partial y > 0 \quad \dots\dots\dots 1.1 \\ & \partial u / \partial e < 0 \end{aligned}$$

在 1.1 式中, y 和 e 分别表示劳动者的收入和劳动努力程度, $\partial u / \partial y > 0$ 表示在给定的时间内, 收入越高, 劳动者的效用越大; $\partial u / \partial e$ 则表示在劳动时间中闲暇越多, 劳动努力程度越小, 劳动者的效用越大。从图 1-1 可以看出, 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激励机制, 劳动者的努力程度将趋于零, 劳动供给效率极低。图中 S 表示闲暇, 设 $S = f(e)$, 且 $ds/de < 0$ 。在固定劳动报酬 (y_0) 条件下, 当劳动者的劳动努力程度等于零时, 其效用最大。图中 e^* 为劳动者的标准努力程度, 其效用水平为 u^* , 小于劳动努力程度 $e = 0$ 时的效用水平。这时就需要对劳动者进行激励, 提高劳动者的努力程度, 即增加 e 的值。在固定劳动时间和固定劳动报酬条件下, 一种有效的办法就是对努力劳动的人进行道德激励, 例如进行各种表彰, 评选先进等, 以提高劳动者的努力程度。

另外, 在人民公社农地产权制度安排下, 提高劳动者努力程度的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对努力程度高的人进行奖励, 即劳动者的报酬是可变。这样劳动者的收入就变成了两个部分, 即基本报酬和奖励报酬, 用公式表示为:

$$\text{劳动者报酬} = \text{基本报酬}(w_0) + \text{奖励报酬}(b) \quad \dots\dots\dots 1.2$$

在 1.2 式中, 基本报酬是指与劳动者努力程度无关的那部分报酬, 奖励报酬是按劳动者的努力程度发放的报酬, 当劳动者的努力程度为标准努力程度时, 给予标准奖励报酬, 当 $e > e^*$ 时, 给予超过标准报酬的奖励报酬; 当 $e < e^*$ 时, 进行扣罚标准报酬, 甚至不给标准报酬, 并进行处罚。设 b^* 为标准奖励报酬, $b(e - e^*)$ 为劳动者提供的劳动努力程度偏高或者偏低标准努力程度 e^* 时的奖励或者处罚, 这样给予劳动者的奖励报酬为:

$$b = b^* + b(e - e^*) \quad \dots\dots\dots 1.3$$

设 p 为劳动者偷懒(劳动时闲暇, 称为在职闲暇)时没有被发现的概率, 则劳动者的预期在职闲暇收益为 $pb(e - e^*)$, 劳动者的预期收益为:

$$y = w_0 + b^* + pb(e - e^*) \quad \dots\dots\dots 1.4$$

令 $y_0 = w_0 + b^*$, 则有:

$$y = y_0 + pb(e - e^*) \quad \dots\dots\dots 1.5$$

由于在固定劳动时间下, 劳动者的劳动供给的行为目标可表述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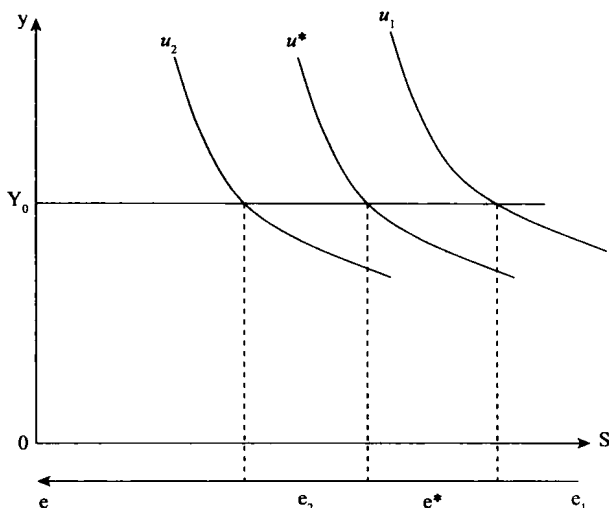


图 1-1 人民公社农地外在产权制度下劳动者的努力程度

$$\max u(y, e) = u[y_0 + pb(e - e^*), e]$$

作为理性劳动者,其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为:

$$\frac{du}{de} = \frac{\partial u}{\partial y} \times p \times b'(e - e^*) + \frac{\partial u}{\partial e} = 0$$

$$\text{即: } \frac{\partial u}{\partial y} \times p \times b'(e - e^*) = -\frac{\partial u}{\partial e} \quad (0 \leq p \leq 1) \quad \dots\dots\dots 1.6$$

1.6 式表明,当劳动者降低劳动努力程度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时,劳动的努力程度达到均衡。

在人民公社的农地外在产权制度安排下,由于共同劳动的人较多, p 较小或者接近于零,即 $pb'(e - e^*)$ 接近于零或者等于零,因此,劳动者的努力程度较低。如果我们逐渐缩小集体规模,则可以预计 p 的值会随着集体规模的逐渐缩小而增大,即是说,劳动者的努力程度会不断提高,当这一规模继续减少至一个人时, p 值最大为 1,即是说劳动者 100% 不会存在偷懒、出工不出力、磨洋工等方式实现闲暇等问题。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人民公社的效率没有高级社好,高级社的效率没有初级社好,初级社的效率不如互助

贵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研究

Guizhou Nongcun Tudi chengbao Jingyingquan Lirizhuanyanjiu

组好^①。

正因为集体所有、集体使用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能很好的调动农业劳动者生产积极性问题,使农业存在大量隐性失业。从表面上看,每个农业劳动力都有活干,实质这种制度安排隐含着大量隐性失业,将多余的劳动力捆在仅有土地空间上。表 1-1 给出了有关专家对农业隐性失业的估计结果,从表 1-1 可以看出,不同专家的估计结果是不一样的,虽然不同学者的估计结果有较大差异,但有学者认为,综合各种估计方法,1994 年中国农业隐性失业量在 1-1.4 亿之间可能是较为合理的(王红玲,1998)。

表 1-1 1994 年中国农业隐性失业

测算人员	测算时间	农业隐性失业绝对数(亿人)	农业隐性失业比率(%)
牛仁亮	1994	0.54	12
	1994	0.86	16
	1994	0.62	13.8
	1994	0.43	10
陈锡康	1987	0.985	—
罗斯基等	1993	≥1	—
王诚	1994	1.38	31
王红玲	1994	1.173	26.07
钟甫宁	1990	≤2	—

注:农业隐性失业量按 1994 年全国农业劳动力 4.5 亿计算。

资料来源:王红玲.我国农业隐性失业的统计测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8(1):61-63.

第二,实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实施人口流动限制政策的基础,最为直接的方法就是限制非户籍人口进入,政府也通过各种人口政策控制人口流动成本以限制外地人口的流入^②。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将人口从空间上进行了分割,人为地将人口划分为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农村人口从事农业,城镇人口从事非农业。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具

① 洪名勇.农地制度与农业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农地内在制度与外在产权制度研究[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8:226-229.

② 蔡昉,都阳,王美艳.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J].经济研究,2001(12):41-49.

有以下特点:一是户口性质,以商品粮供应为标准,将户口登记为“农业户”和“非农业户”,形成城乡户口性质的二元结构;二是户口迁移,制定多项“农转非”政策和计划控制指标,实行政策与指标双重控制的管理体制,对农村人口进城和从小城市迁入大城市进行严格控制,几乎一定终身。城乡之间,可谓壁垒森严,好像一道无形的不可逾越的长城,将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分隔开来。一个农村户口的公民,若不是通过升学、参军、提干等途径,要想改变户口,那是无路可走^①。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提供的资料,1978年全国人口为9.63亿,其中城镇人口仅为1.72亿,农村人口为7.91亿,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高达82.14%。就贵州来讲,1978年贵州总人口为2686.4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323.97万人,农村人口为2362.43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87.94%。

传统土地产权制度和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安排,将过多的农村人口和过多的农业劳动力压迫在农村和土地之上。这造成大量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和低效率。

表1-2 土地制度改革前后主要农产品产量比较 单位:万吨、%

	粮食	棉花	油料	糖料	水果	水产品	猪牛羊肉
1978	30476.5	216.7	521.8	2381.9	657	465.4	865.3
1984	40730.5	625.8	1191	4780.4	984.5	705.2	1540.6
增加量	10254	409.1	669.2	2398.5	327.5	239.8	675.3
增长幅度	33.65	188.79	128.25	100.70	49.85	51.53	78.0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P37-3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农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解决了中国的吃饭问题。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跃上3亿吨之后,1984年中国粮食产量再次跃上4亿吨台阶,之前中国粮食由2亿吨增加到3亿吨花了12年时间(1966年至1978年),而由3亿吨增加至4亿吨仅用了6年时间。这说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民生产潜能的释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棉花、油料、糖料、水果、水产品 and 猪牛羊肉也大幅度增产(详见表1-2)。农业经济的发

^① 曹景椿:加强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人口迁移和城镇化进程[J].人口研究,2001(5)9:17.

展带来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升,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由 1978 年的 133.6 元增加至 1984 年的 355.3 元,增加 221.7 元,增长 1.66 倍;农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增长让农民生活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改善,农民人均消费支出由 1978 年的 116.1 元增加到 1984 年的 273.8 元,增加 157.7 元,增长 1.36 倍。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农村市场的繁荣,如果我们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来对市场发展进行度量的话,全国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 1978 年的 380.4 亿元增加至 1984 年的 586.4 亿元,增加 206 亿元,增长 54.15%,县以下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 1978 年的 673 亿元增加至 1984 年的 1441.3 亿元,增加 768.3 亿元,增长 1.14 倍。农村市场的逐步发育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开始显现,农民多余的钱存在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满足有关企业、家庭和个人对资金的需求,激活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功能,从而使中国逐渐走上一条市场经济之路。

二、城镇化的推进

城镇化的推进对人口和劳动力形成巨大需求。长期以来,由于中国人口大量不能进城,积压在农村,农村土地长期超载,形成巨大的人口压力,城镇化的推进一方面对农村人有极大的诱惑力,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到城镇;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动,改变了农村土地供需均衡,一部分农户由于劳动力外出务工有多余的土地需要流入市场,另一部分农户由于没有劳动力外出务工或者只有部分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对土地有较多需求。

从理论上讲,城镇化是指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向城市社会化大生产转化的过程,是在人类社会分工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农业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等非农产业,人口从农村逐渐聚集到城镇,从而使城镇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日益增大,城镇人口迅速增长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城镇化至少包含以下含义:第一,经济活动向城镇集中,尤其是工业经济的发展需要相应的空间,使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犹如同胞兄弟,同生同长,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容,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落实。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和共同发展的关系。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与农业生产相比,工业生产是一种更为集中的经济活动,因此,工业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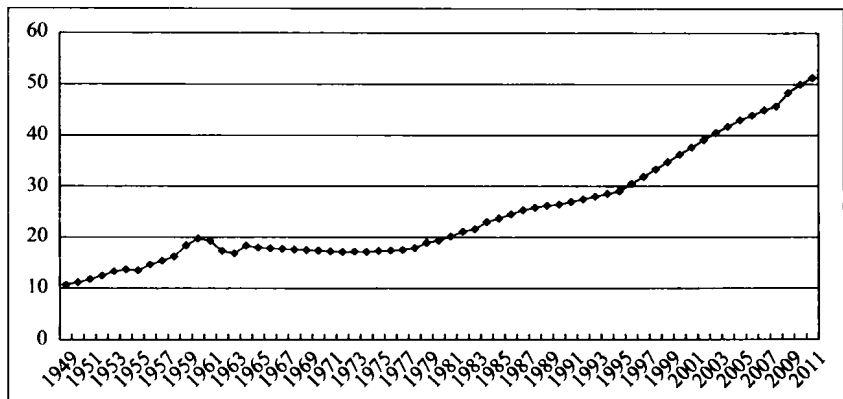


图 1-2 1949 年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P37-38,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统计年鉴(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过程就是经济活动的集聚过程,这种集聚过程必然引起人口的集中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相对集中。当人口和生产要素以及经济活动在一定区位的集中达到一定规模和程度时,就会形成城镇。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城镇规模会不断扩大,促进城镇化的进程,并且形成对金融、交通、信息、商店、餐饮、文化、娱乐等产业服务的需求,从而推进城镇第三产业的兴起与繁荣^①。第二,人口从农村到城镇,实现城镇人口的数量增加,扩大城镇的人口规模。第三,农民的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意味着“农民”不是同质的,而是异质的,因此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狭义的上讲,农民市民化主要是指农民、城市农民工等在身份上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如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等。在中国,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获得所在地的城市户口及其相应的社会权利。从广义来来看,农民市民化是指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

^① 洪名勇. 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研究[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6):64-71.

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①。

图1-2是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简单刻画,从图中可以看出,1949年至1960年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度量的中国城镇化率是不断上升的,由1949年的10.64%上升为19.75%,由于受到户籍制度以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因素的影响,196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开始下降,1972年为17.13%,下降谷底,至1980年只有19.39%,还未恢复至1960年的水平。应该说,以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农村制度改革及城镇体制改革开始促进了中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特别是1980年之后,城镇化水平上升较快,至2011年中国首次出现了城镇人口超过农村人口,2011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51.27%,农村人口所占比例为48.72%,城镇人口所占比例高于农村人口所占比例2.54个百分点。

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推进,不仅创造了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的条件和可能,而且减轻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对于本研究课题来讲,更为重要的是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创新对土地流转的需求,城镇空间的拓展必须要以农村土地转为城镇土地为前提,为城镇的发展提供相应的空间;另一方面又创造了土地的供给,农村人口通过上学、就业等渠道流向城镇后,减轻了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而且由于城镇的高收入、较好的福利以及社会保障等条件让进入到城镇的正式职工以及其他人员意愿放弃农村土地,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提供土地供给。

三、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后提供了可供流转的土地

正是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激发劳动力的生产积极性和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双重影响下,农村隐性失业转化为公开失业,并且从农业走向非农产业、从农村走向城镇。在前面我们对城镇化的描述中,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是以国家正规统计为基础,事实上,在城镇生活的,除正规统计人口之外,还有一个较大的群体就是从农村来到城镇务工的农民,目前多将这批农民称为“农民工”。在国家公布的统计年鉴中,这些“农民工”没有纳入国家统计

^① 文军. 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3):55-61.